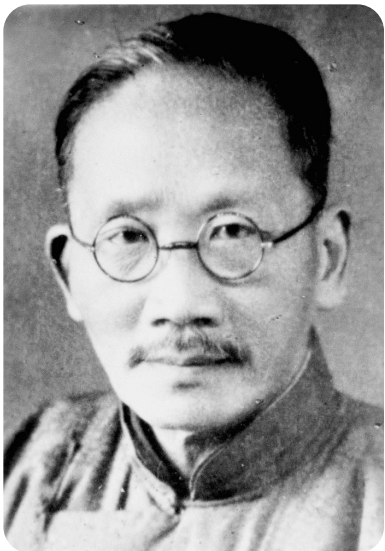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蔡元培

□ 祝 彦 刘朝华



陈独秀



蔡元培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纪念这一伟大爱国运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了解领导这个运动的陈独秀，以及对这一运动发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之交，陈独秀与蔡元培从相遇相识相知，到后来的分道扬镳，生动地演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史话。

相识于反清爱国组织

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志士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陈独秀也受此影响，曾加入过暗杀组织，并与蔡元培相识于暗杀团。

1903年7月，革命组织东京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改组，确定“暗杀”为其重点工作之一。1904年，为配合黄兴的华兴会在长沙起事，军国民教育会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人召集革命同志在上海组建爱国协会，成立暗杀团，把暗杀定为革命方式，经常开展射击练习、试制炸弹等活动。在老朋友章士钊的引荐下，陈独秀到上海并很快加入这个组织，也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蔡元培相遇相识了。两人的此次相遇相识为日后的相知打下了牢固的友谊基础。此时的陈独秀尽管加入了暗杀团组织，但是他认为“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儒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可见，陈独秀一边参与暗杀的革命活动，一边却非常关注发动群众的一面，这与一般热衷于暴力暗杀的革命者不同，见解独到的陈独秀开始把目光聚焦在民众的争取动员上。

1905年9月，吴樾暗杀清朝五大臣事件失败，陈独秀收集烈士部分遗物后，几经周折，最后转交给暗杀团骨干之一的蔡元培保存。吴樾的革命行动，令陈独秀和蔡元培为之动容，蔡元培赞誉其行为乃“中国第一炸弹”。陈独秀则在后来悼念烈士时写下了赞颂吴樾的《存殁六绝句》的怀念战友诗。革命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勇于牺牲、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心里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责任担当，逐渐把两位年龄相差11岁的历史传奇人物从相隔千里的陌生人变成了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相知于北京大学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决心改革北京大学的迂腐学风校风。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从北大文科开始，为了破解顽

固守旧派占优的局面，蔡元培决定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来主持和充实北大文科。在朋友的推荐下，蔡元培决定聘请陈独秀。陈蔡两人早在暗杀组织结识，蔡元培对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尤其对陈在芜湖办的《安徽俗话报》印象很深，经过一番考察和翻阅《新青年》后，蔡元培认为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以“三顾茅庐”态度亲自去请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此时，恰逢陈独秀因为亚东书社和群益书社合并事宜来到北京，与汪孟邹住在前门的一家名叫中西旅馆的小旅社。打听到陈独秀的住处之后，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连续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床来。他招呼茶饭，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被蔡元培三顾茅庐的诚恳之举打动，便答应先在北京大学“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回沪”。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发布布告，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入主北京大学文科之后，在蔡元培的倾力支持下，一面对北大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面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宗旨，联络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优秀分子，建构起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这批具有新思想的北大学子中，陈独秀团结了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鲁迅、章士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自己的周围，形成新文化运动阵营，并借助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这个思想文化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引领青年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立志成为“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

发的奋发有为的青年”。一时间，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激荡，交锋交锋，一些进步社团和刊物也效仿《新青年》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大学纷纷创立，并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大学学生立刻行动起来。5月2日，蔡元培在学校餐厅召开学生班长和代表会议，号召大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奋起救国。陈独秀在5月4日刊出的《每周评论》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但是，北洋政府却施行反动的高压政策，不断地逮捕和镇压学生，并逼走北大校长蔡元培，逮捕陈独秀。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声援和支持下，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始终互相支持、密切配合，身先士卒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陈、蔡二人是志同道合的北大同事，又是五四运动中的战友。

分道扬镳于谣言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招来了顽固守旧势力近乎疯狂的攻击，其中发生了两件最典型的事情。由此也影响到了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关系。

一件是旧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林纾还发表《致蔡元培书》，攻击指责新文化运动人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爱护陈独秀，从捍卫新文化运动立场写了一封还击林纾的长信。信中指

出：北大教授讲解古书时虽用白话，但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是博学且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表明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但是，出于维护北大的整体利益考虑，蔡元培无奈妥协，决定暑假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自然免除。

另一件事便是守旧派连续散布攻击陈独秀的谣言。一个是他们向《神州日报》提供谣言，说陈独秀因为思想激进，已受到政府出面干涉，被迫辞职于北大。对于这一谣言，蔡元培出面发表《致神州日报函》进行了辟谣。第二个是顽固守旧派散布关于陈独秀个人私德的谣言。在各种谣言盛传的压力下，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决定提前“文理合并不设学长”。不久，陈独秀被改聘为教授，文科学长之职被撤销。

由于各种原因，这次蔡元培没能坚定地站在陈独秀一边，两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离开北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开始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而作为老同盟会会员的蔡元培则开始了其国民党党国元老的人生。

政见虽异 友谊不变

尽管陈独秀和蔡元培于五四运动后，各自的人生走出了不同的历史轨迹，但是不论是作为中共早期领袖的陈独秀还是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两人始终拥有观照国家兴亡的情怀，始终没有放弃聚焦中国政治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陈蔡两人虽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互相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中断，两人相互包容、相互帮助、相互欣赏和怜惜。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蔡元培联合杨杏佛、林语堂等其他社会贤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对陈独秀宽大处理。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闻听消息，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表达了这种哀悼之情，“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又增一伤痕矣！”并以病弱之躯写下《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表达对老朋友的怀念。陈独秀在文章中对蔡元培的人格人品给予高度赞誉，他说，蔡先生对下决心的事很是坚持，且态度温和，令人佩服。生前蔡元培也极为欣赏陈独秀的个人品格，他曾说，陈独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我要去延安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朝圣』之旅

□ 崔 苗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广大的国统区、沦陷区、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海外，一大批爱国青年为了寻求国格独立、人格自由，以宝塔山为指引，开启了“朝圣”之旅，潮水般地涌入延安。他们主要通过党组织和个人介绍，或者参加延安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奔赴延安，在1938年前后形成高潮，因此后来也被称为“三八式”干部。“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喊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据统计，这一阶段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余人，他们大多为知识分子，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占了70%左右，还有像陈学昭、何穆这样的留洋博士。

希望之光

知识青年是通过对国共政治主张以及实际行动的对比，最后选择了共产党。当时，国民党曾把三青团作为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具，但是由于人心向背，没能争取得到青年。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红色书刊帮助青年更好地认识了共产党。恰在此时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其中抗大的招生广告就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各地青年踊跃报名。此外，延安还有“来去自由”政策，进一步打消了知识青年来延安的疑虑。他们认为选择了延安就等于选择了光明，“到延安去”就由心灵呼唤变为实际行动。有一位新加坡华侨青年叫吴醒柏，家境富裕，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决心回国抗战。可是家里百般阻挠，他就偷跑到香港。其父乘专机追到香港劝他返回，可是他毅然拒绝了父亲的请求。先是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和五六十个青年一起步行到延安。到延安地界时，他跪在地上捧起一把黄土，紧紧贴在胸口上，无限动情地说：“祖国啊，就剩下这一块干净土了！”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过程中，起到桥梁和堡垒作用。仅1937年到1938年，它就向延安输送了2万青年。办事处的工作非常繁忙，负责人伍云甫经常亲自坐在门口接待。从西安到延安，总共八百里路程，大部分人需要徒步大约14天才能到达。旅途中除了国民党设置的重重政治关卡外，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成极大障碍。这里很难找到水源，还有野狼出没，时常伤人。但是，即便如此，爱国青年甘愿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来铸就这条理想之路、信仰之路。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直接匍匐在地上，亲吻着这片黄土地。

革命熔炉

在延安，负责接待爱国青年的机构是延安交际处，由这里安排食宿，造册登记，然后大多数人进入各类院校和培训班，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同志”。知识青年的到来不仅为党储备了宝贵人才，而且为改变国共对垒的

政治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用陈云的话来说：“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

青年们虽然满怀革命热情，但是理论高度和实际斗争经验不足，思想状况也比较复杂，不够成熟。因此，党中央对这些青年给予高度重视，并决心把他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干部。1938年5月，中央青委在杨家岭成立，陈云兼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中央青委在延安9年间，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在培训青年干部，组织青年抗战，参与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整座山城俨然成为一所窑洞大学。知识青年纷纷进入学校学习。领导干部十分关心学员，经常应邀讲话或讲课。例如，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中指出，学员来抗大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1939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等文章中，都号召青年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广大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

成才之地

这些爱国青年到达延安后，发现这里与他们以前生活的环境完全是两个世界，这对他们是一个严峻挑战。他们自愿脱下西装皮鞋，扔掉口红、高跟鞋，穿上了八路军军装，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决心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挖窑洞建宿舍，露天上课。没有纸张，就在石板或沙盘上写字，桦树皮就是免费的纸张，剩下来一层就能写字。没有钟表，就用石日晷计时。总之，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依然能够刻苦学习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一位印尼朋友称赞道：“共产党真了不起，吃小米饭啃《资本论》。”

知识青年从延安获得革命的思想武器，然后纷纷走上救国救民的前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走上抗日前线，参与对敌斗争，这是他们的初心所在。仅抗大，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办学期间共培养了10万政治和军事人才，他们分别充实到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惜贡献出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有些人留在边区。本来，当时很多青年都想去前线抗战，不愿意留在边区。毛泽东亲自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老母鸡，是抱鸡娃的，你们留在边区作的贡献不比上前线小。因此，留在边区的青年，直接参与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有的当了学校的专职教员，培育了更多青年，有的走向了敌后，到群众中访贫问苦，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动员，在党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当中有些人被打入国民党内部，在隐蔽战线工作。张露萍，1939年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南方局军事组，其间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她的身份暴露被捕，国民党特务对她用尽酷刑，也没能从她口中得到我党的任何机密。1945年，年仅24岁的她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他们茁壮成长起来，然后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知识青年树立起一座爱国奋斗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代青年学习。

